

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与工业化的曲折发展 ——《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与 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中）

王海光

摘要: 本文用政治文本学的实证研究方法, 以《论十大关系》经典化过程中的三个历史文本(1958年稿本、1965年稿本、1975年稿本)为基本史料, 梳理了《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演变和经典化的过程, 考察了其文本流变与“反冒进”、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文革运动的历史语境关系, 澄清了一些长期流传的误读误解的问题。以期通过“以苏为鉴”和“以苏为师”、“多快好省”和综合平衡、“重轻农”和“农轻重”、革命和生产等矛盾问题的分析, 探讨其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的内在冲突, 呈现一个认识毛时代工业化道路的文本视角。本期刊登的中篇集中梳理《论十大关系》文本的经典化过程, 及其所体现的毛泽东时代工业化的曲折发展过程。

关键词: 《论十大关系》; 反冒进; 大跃进; 毛泽东著作经典化; 中国工业化道路

作者: 王海光,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 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当代史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他的主要著作有:《旋转的历史》(1995年出版);《从革命到改革》(2000年出版);《林彪事件》(2012年出版)。邮箱: wanghaiguang@sina.com

Title: The proposal of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ra of Mao Zedong

Abstract: With political textual analysis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his article uses three historical manuscripts (1958, 1965 and 1975) as raw data to process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In addition to sorting out the processes of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canonization of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will also investigat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deformation with "Anti-rash Advance", "Great Leap Forward", National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campaign. This is to clarify the misunderstanding that have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se principles: "taking the Soviet Union as a guide" and taking the Soviet Union as the teacher, "how fast and good province" and comprehensive balance, "heavy light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light weight", revolution and produc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textual perspective that recognizes the path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Mao era.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f the classicization process of the text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nd internal conflicts fac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Mao Zedong era.

Keywords: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nti-rash Advance; Great Leap Forward; canonization of Mao Zedong's works; the journey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uthor: Wang Haiguang, is a retired history Professor at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He currently holds a Visiting Professorship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Wang'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His main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 Rotation of the History (published in 1995),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published in 2000) and The Lin Biao Event (published in 2012). Email: wanghaiguang@sina.com

从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到 1976 年 12 月《论十大关系》的正式公布于众，经过了 20 年的时间，先后搞出了三个稿本，分别是 1958 年版本、1965 年版本和 1975 年版本。从经典化的过程上看，《论十大关系》的文稿整理工作，可谓一波三折。先后经过邓力群、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等党内大秀才之手，最终在胡乔木手中完成了文本的经典化。但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得以正式公布于世。整个经典化过程，是一个击鼓传花轮到最后的自然生命结果。在这个经典化的整理过程中，每个整理稿本都带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依次给打上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烙印。然而，《论十大关系》统筹兼顾的工业化理论却没有真正落实到中国的工业化实践上来。历史走了一条反其道而行

之的左倾化道路，由激进的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发展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路线，这是《论十大关系》整理语境不断劣化的历史背景。本篇将主要从文本的角度分析《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过程，并且从这些文本的发展过程来审视毛时代工业化发展的特点。

一、“多快好省”与协调发展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从1955年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8年激进的大跃进运动之间，正是毛泽东从提出《论十大关系》，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下简称《正处》）的时间段。《论十大关系》讲经济，《正处》讲政治，中心点都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时曾说，《论十大关系》中的“是非关系”，讲的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论十大关系》，大都是与《正处》放在一起讲的。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也是把这两篇著作作为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正确思想的代表作，其核心思想是“统筹兼顾”。

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论十大关系》没有贯彻下去？正确的思想却得到了错误的结果？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坊间比较流行的是毛泽东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背离说”。“背离说”不仅理论上自相矛盾，事实上也不是如此。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对《论十大关系》提得最多，党内外也宣传最多的时期，恰恰就是在大跃进时期的三年。而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和文革的全面整顿时期，恰恰是提得最少或是根本不提的。这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内容本身具有的二重性，既有盲目跃进的强调“多快”的一面，也有兼顾各方的强调“好省”的另一面。这种在理解上的多义性，在政策实践上是不同的方向。这就需要从文本政治学的角度进行考辩。

文本政治学就是通过解读文本的微言大义，启发某种思想观念，以建立理论对实践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意识形态主导政策的国家体制中，一个文本的定稿公布，实际上就标志着它所代表的思想观念的正式定型。对于《正处》的文本修订公布过程与反右派运动的关联逻辑，学界一般是比较清楚的。在整风运动转为反右后，毛

泽东对《正处》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增添了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等内容，把原本是整风鸣放的号召书，修改成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¹但对于《论十大关系》与大跃进的关联逻辑，学界由于缺乏原始文本为据，没有对其文本流变的考辨，很多问题难以清楚。虽然也有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从“多、快、好、省”分析《论十大关系》的思想主旨，但多是依据公开定稿的经典版本，缺乏对文本流变的考辨，造成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由于缺乏对其经典化过程的语境分析，过分解读的情况非常普遍。本文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个是对《论十大关系》文本流变的考察；一个是对《论十大关系》政策影响的考察。具体说来，就是毛泽东自己怎么讲的？党内同志如何理解的？在政策方针上是如何体现的？在实践中如何贯彻实施的？

探讨《论十大关系》与大跃进的关联逻辑，实际上就是考辨“多快好省”高速发展与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互动关系。历史的关节点就是1956年的“反冒进”事件。在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后，党内高层在建设方针上发生了重大分歧。陈云、周恩来鉴于基建过大、投资过热的盲目“冒进”势头，提出了“反冒进”的经济方针，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阻挡住了毛泽东要求大干快上的跃进冲动。这一事件本身，反映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共党内激发起来的急躁冒进情绪和协调发展的经济理性之间的冲突，也可以看到党内对《论十大关系》不同理解的认知分歧。

在1955年下半年底，全国农业集体化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上的右倾保守已经解决了，现在应该是在经济建设上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了。²在开始准备中共八大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八大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反对右倾保守。他对国家计委编制“二五计划”所设想的发展速度不满意，12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说：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整个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毛泽东还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99-700页。

2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人民日报》1956年1月12日。

提出了“促进会”的说法。意思是说大家都要做促进派，不做促退派。对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一开始都是赞同的。

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正式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社论说：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³这个貌似全面的双重性口号，真正的目的是“反对保守主义”，强调大干快上。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农业四十条），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发表。《纲要》提出了农业发展的高指标，实际上是达不到的。接着，一直有好大喜功不断革命追求的毛泽东，又把目光投入到了他所不熟悉的工业领域。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听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汇报工作，薄偶然提起刘少奇正在为准备中共八大而逐一约谈中央国务院各部门领导人，毛泽东很感兴趣，立即要薄也给他组织一下。⁴从表面上看，这个听汇报的原由，似乎有很大的随机性，但却是毛泽东这一年来急于求成思想不断强化的逻辑使然。

毛泽东的听汇报与刘少奇的听汇报，动机和主旨是不尽相同的。刘少奇是为中共八大报告摸情况，以确定八大的主题报告思路；毛泽东是为推动建设高潮的鼓干劲，以确定如何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实现工业化赶超战略。通过各部委的汇报，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商业、外贸、交通运输、财政金融、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问题，对现代工业生产 and 现代经济管理的复杂性有所认识，思想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听汇报的第一阶段，毛泽东谈话的中心思想还是如何大干快上，要求把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他说：中央束缚了地方发展的手脚；多搞基本建设，结果利润会更大；中国的党委制优越

3 <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人民日报》1956年1月1日。

4 1956年1月中旬，薄一波在汇报工作时，偶然讲到刘少奇正在为准备中共八大而约谈中央国务院各部门领导人，毛泽东立即要薄也给他组织一下国务院各部委的汇报。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于苏联的一长制；还说经济建设就是要“好大喜功”等等。⁵在听汇报后期，毛泽东调整了急于求成的心态，吸取了苏联工业化忽视人民生活的教训，开始综合考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因素，在发展速度上也表现了比较冷静的态度。他在听汇报时讲：“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是负担不起的，这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二五计划的轻工业投资要略有增加等。⁶可见，毛泽东通过对现代工业经济体系的初步了解，同时接受了来自苏共二十大的启示，使他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中国工业化的问题，自己给自己降了温。

如果用“多、快、好、省”的语句来概括这个前后变化，毛泽东在汇报开始时的关注重点是“多、快”，占主导的是好大喜功的思想；在汇报后期的关注重点则是“好、省”，占主导的是统筹兼顾的思想。这个思想重心的转移过程，构成了“十大关系”形成的政策语境。一同听汇报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人都有贡献。毛泽东后来多次讲：他原来的好大喜功思想，就是在这次听各部委集体汇报后才有了转变。⁷

作为这次听各部委集体汇报的理论成果，《论十大关系》体现的“统筹兼顾”思想，一向被认为是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理论贡献。然而，从《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本身讲，十项关系的统筹兼顾是从属于加快实现工业化赶超目标的，是实现“多、快、好、省”的策略方针，而不是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十大关系”报告中开宗明义地讲：“提出这十大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⁸所谓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具体说来，就是依靠基本力量，争取中间力量，转化敌对力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28、529、531、537、544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1-563页。

7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4月30日。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42页。

8 《论十大关系》，中共中央1965年12月27日下发党内文件版，中发[65]751号。

量。以敌我友的政治分类，来认识和解决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在方法论上是大有问题的。不难看出，这是沿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社会动员模式。在战争动员型经济模式下的“统筹兼顾”，是从属于整个赶超战略的技术性问题。所以，在如何实现“统筹兼顾”的技术性问题上，就出现了所谓“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的对立和冲突。毛泽东所谓“平衡”不是绝对的观点，也由此而来了。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提出，妥善处理好国民经济发展的各项矛盾关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政策目标明确清晰，立即得到了党内外人士的热烈欢迎。然而，由于《论十大关系》在内容上的综合性和政策上的多义性，从一开始在中央高层中就存在着不同理解和不同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不仅反映在高速发展还是协调发展的路线方针上，也反映在“十大关系”主次轻重的具体政策安排方面。

毛泽东无疑是最具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中共领导人，苏共二十大披露出的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诸多问题，增强了毛泽东赶超苏联的信心。他甚至把中国“一穷二白”的后发国家负面包袱，也作为可以在经济建设速度上超过苏联的正面因素。毛泽东在按照苏联模式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后，由国家垄断了所有社会资源，但并不满意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教条刻板，希望通过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来实现大干快上的社会动员效果。在中央部门的“条条”与地方政府的“块块”的条块关系中，毛泽东特别看重“块块”的作用。在听取国家各部委汇报后，毛泽东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也要准备汇报，并亲自阅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工作汇报的指示》，拟定了10条汇报题目。⁹这个听取各地汇报的举动，实际上带有了督促地方加快发展的意思。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和部门都有近乎病态的投资饥渴症。在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毛泽东反右倾保守思想的刺激下，各地各部门为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纷纷提出宏大的经济发展目标，赶超冲动十分强烈。周恩来、陈云这些政府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虽然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化战略上与毛泽东

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2册，第385-386页。

是完全一致的，但在计划安排的具体问题上，不能不量入为出，从全国一盘棋出发，综合平衡，量力而行，限制地方盲目上马的乱铺摊子上项目。毛泽东可以有革命浪漫主义的天马行空、高屋建瓴的大手笔。但周恩来、陈云他们则是要算经济账的，必须要考虑人、财、物能不能支持，“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¹⁰在“多、快、好、省”方面，毛泽东强调“多、快”，周恩来、陈云强调“好、省”。¹¹所以，在对《论十大关系》的理解和贯彻上，中央高层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同的思路和态度。

《论十大关系》与国务院工作的关联度最高，周恩来宣传贯彻也最积极。他先后在国务院司局长干部会议、国务院体制会议、全国公检法联系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不同场合宣讲“十大关系”，以统筹兼顾的思想来部署各项工作，并上升到方法论高度来解释它的意义。周恩来说：“论十大关系”告诉我们，搞好一件事情，需要反过来考虑一下问题。你要搞更多的重工业，就要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你要真正地去建设内地工业基地，就要很好地发展沿海工业；你要加强国防力量，你就要很好地进行经济建设；你要集体利益更发展，你就要适当地照顾个人利益；你要巩固中央的集中领导，你就要适当地分权给地方；你要达到全国人民团结的目的，你就要加强各民族团结，和党外群众、各民主党派合作，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你要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少犯错误，你就要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你要巩固革命的专政，就要更好地改造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你要巩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要扩大工人阶级的和平的统一战线，孤立美国好战集团。¹²

朱德是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在4月27日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时曾有系统发言。经过深思熟虑后，朱德在1956年8月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报送给中央。¹³这份报告说：解决了这十大矛盾，

10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陈云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09页。

12 周恩来：〈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和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讲话〉，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99页。

13 《朱德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4-405页。

“就能够动员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逐条提出了一些具体落实的政策建议。主要内容有：1、利用轻工业、沿海地区工业发展对外贸易，支持重工业；民用工业与国防工业结合，把第一、二机械工业部合并；2、发展供销合作社，作为工业和农业的桥梁，国家与群众的缓冲垫；3、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核心，主要是如何建立合理的四级财政体制。确定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给地方稳定的财政；4、大汉族主义和工作中急躁图快的思想，都会破坏民族关系；5、对于旧知识分子、科学家、公教人员等，都应予以使用和信任；6、对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分子和一般的反革命分子，要一律给出路，把他们从革命的对象改造成为团结的对象；7、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必须持诚恳相待的治病救人态度，打倒的办法是错误的；8、在对外关系上，不仅要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与民族国家交往，还要与帝国主义国家交往，取人所长，补我所短，解决资金不足、某些原料缺乏、技术不高等问题。¹⁴

朱德给中央的这些政策建议，体现了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兼顾各方的建设思想，现实针对性很强，既有高屋建瓴的全局性，又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现在看来也是弥足高明的。如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工业体系建设思路；以四级财政体制确定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关系；信任知识分子的人才政策；给出路的阶级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对外开放政策等等，其前瞻性和正确性已被以后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这一时期，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著名主张，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补充国家和集体经营；以国家许可的自由生产补充计划生产；以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补充国家市场。陈云的这个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营同时并存的设想，试图用市场的方式部分解决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后人民生活困难的问题，这是对《论十大关系》的改进体制思想的发挥，客观上也是对苏联大一统计划体制的调整性突破。

朱德、陈云等人的这些政策建议，虽然没有被毛泽东采纳，但提出问题的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反映了中共党内开始萌发的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建设意识。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共党内的开放

14 朱德：〈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风气。

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认识分歧在具体政策上的体现，是在“反冒进”问题上。在毛泽东一再鼓动反右倾思想的驱动下，党内急躁冒进的情绪十分强烈，铺摊子上项目的基建投资规模不断膨胀，国务院三令五申压不下来。到1956年4月，已造成财政、物资的全面紧张，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要求：“一定要为综合平衡而奋斗”¹⁵。但在4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要追加基建投资20个亿，遭到了周恩来为代表的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会后，周恩来甚至还当面对毛讲出了“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样的重话。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就离开了北京。¹⁶

周恩来、陈云大力压缩投资规模，提出了“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政策主张，得到了政治局大多数的支持。根据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了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明确提出了急躁冒进也是有害的，也要反对。在送毛泽东审阅时，他很生气，批示“不看了”。他后来说：“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严厉批判这篇社论“有原则性的错误”。¹⁷

“反冒进”是中央高层的集体共识，阻击了毛泽东的冒进冲动，暂时地抑制住了党内盲目赶超的急躁情绪。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根据《论十大关系》的“统筹兼顾”思想和上半年“反冒进”的具体经验，制定了八大政治报告¹⁸。提出了既反保守主义又反冒险主义，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周恩来在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时，提出了“均衡发展，综合平衡”的“反急躁冒进”方针，要求“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陈云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12页。

16 〈胡乔木谈1956年“反冒进”和1958年批“反冒进”的一些情况〉，1982年11月4日。转引自《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69页。

17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传达稿），1958年1月。

18 《胡乔木传记》编写组：《胡乔木传》（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255页。

可靠的基础上”，还特别提出了“留一手”的思想。“为了消除或者减少在执行计划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平衡现象”，必须保留必要的后备力量。¹⁹这是吸取了经济建设盲目冒进的教训。周恩来在1956年7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得到一条教训，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²⁰

这段时间，在中央经济部门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是把“十大关系”作为综合平衡、稳妥发展的“反冒进”政策依据。在10月下旬到11月的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连续批评“冒进”：经济建设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长远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也带了起来。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并说：“毛主席提出的论十大关系，主要的是经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摆得不恰当，经济基础即不巩固。”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把原来设想的建设速度放慢。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目的是要保持平衡。²¹周恩来是把《论十大关系》作为“反冒进”的政策依据。

国际共运的外部环境也是支持“反冒进”方针的。波匈事件给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一个重大教训是，搞工业化必须照顾人民生活，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刘少奇报告波匈事件经过及其教训，第一条就是：“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²²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的小组长会议上提出了七条意见，要求在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标时，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毛泽东后来在批判“反冒进”时讲，这是他的一个妥协方案，是给“反冒进”挡一下水。²³实际上，毛泽东这里讲的是两面话：先是肯定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大部分是正确的，再讲1957年的年度计

19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8-221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00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29-630页。

22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1956年11月10日；《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79页。

23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划必须要做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²⁴。它所表达的意思，与其说这是“挡水”，不如说找台阶。

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联系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教训说：苏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我们应该引以为戒，中国搞的是“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工业化政策。1957年的经济建设方针是“保证重点，适当收缩”。周恩来还说：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是八大的指导方针。“正确地解决这十大关系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够安排得更恰当。”²⁵

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的总结发言中，讲了六个方面的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与小民主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整风和整编问题。在讲到中苏关系时突出强调了中共的独立性：“我们中国革命和工作的方针、政策、路线，都是我们党依照中国的特点、情况，独立确定和制定的。”还特别讲到：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经济建设的十大关系，都是中国的做法。²⁶

毛泽东认为，经过几年大规模的镇反和肃反，中国的反革命分子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阶级矛盾基本解决，当前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八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提出了整风的任务。主要是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贪污浪费以及下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²⁷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正式做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

与毛泽东此时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相联系，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讲话，强调经济建设必须要积极稳妥，而且多次检讨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好大喜功”。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他以自我

24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1月13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32页。

25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0-231页。

26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1956年11月15日。

27 同上。

批评的口吻说：我们搞建设没有经验，有些朝令夕改。还说“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了十大关系，其中有五条是属于经济方面的。”²⁸

毛泽东这次讲话，当时还有一个给民主党派的传达稿，对提出“十大关系”的思路形成过程说得更清楚。在这篇传达稿中，毛说：“有人批评共产党办事‘朝令夕改’，有一部分是这样。我们常常开会，就是要改，因为我们做工作时没有经验，常常有不合适的地方，发现了就要改，特别是工作计划，订了要改，五年计划搞出后，去年我找了几十个部长谈话，才知道搞大了些。就提出十大关系，中央与地方、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工业等方面的比重都有所改变。今年已将国防工业减少了一些，开了一个月会，才把思想打通。”他还讲“我们准备在今年，总结一下国家建设经验，做做看，暂不下结论。合作社的经验，也可以总结。”可能比苏联搞得快些好些。²⁹

1957年7月在国家经委编制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在吸取了1956年经济“冒进”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综合平衡”的方针。³⁰毛泽东重新提起“反冒进”问题，是在反右派运动后的事情。

从《论十大关系》的经济方针，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方针，都是毛泽东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提出来的。毛泽东还讲：所谓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在《正处》修改中，也补充了相关内容，有关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论述，明确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³¹

随着整风到反右的大逆转，毛泽东改变了“论十大关系”的统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2页。

29 转引自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98页。

30 薄一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9页。

筹兼顾的政策基调，重新确定了破除迷信、多快好省的主题。毛泽东的这个变化，是与整风鸣放中的批评毛泽东工业化赶超路线的“右派言论”相联系的。

在整风运动中，许多鸣放言论是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意见，尤其以对大轰大嗡的动员型经济建设方式的意见最为集中，许多人提出了善意而又不无严厉的批评，1956年的经济冒进是一个批评重点。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头面人物还直接批评到毛泽东的头上。如著名民主人士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批评毛泽东“偏听偏信，好大喜功，喜怒无常，轻视古董”。³² 这些言论对毛是有些刺激性的。许多党内同志也有“中央掌握政策不稳”的啧啧烦言。有的说“几年来几次大的冒进都是上边灌下来的”，反右倾中的许多问题，中央应在基本指导上负主要责任。有的还说“恐怕张奚若说的‘好大喜功’有点对，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还有思想意识问题。”³³

在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对这些批评中共“好大喜功”的言论进行了激烈的反批评。195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点名批判了张奚若、陈铭枢，慨然宣称：“我们好六亿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有什么不好？”³⁴

在反右派运动巨大政治声势下，毛泽东又重新为1956年的“冒进”正名，公开批评“反冒进”。因为社会上批评中共经济政策的鸣放言论，对1956年经济冒进的批评，1957年6月26日，

32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11日晚。陈铭枢所言为毛泽东自己的归纳。陈铭枢1957年上书毛泽东，先称赞毛泽东要推辞国家主席是“此天下之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之所为也。”后面讽谏进言，也是极尽婉转。“好大喜功”是毛泽东多次讲话的自道之言，陈只是表示了同感。其他言论是：“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有时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过分鄙夷旧的，但也值得商榷”。毛泽东将其言归纳成“偏听偏信，好大喜功，喜怒无常，轻视古董”，作为右派猖狂进攻的代表言论。

33 〈党校普通班、新闻班整风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1期，1957年6月26日。

34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要点〉，《毛泽东思想万岁》5卷本，第4卷，第17页；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0页。

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说：1956年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决不能说全面冒进。³⁵为了反击右派言论，主动放弃了“反冒进”的说法。在9月下旬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给吹掉了，要加以恢复。1958年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跃进口号。

在1958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连续批评“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说：“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伤了许多人的心，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在成都会议上又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我看应采取“冒进”。³⁶作为“反冒进”的始作俑者，周恩来、陈云等人被迫作了沉痛检讨。在批“反冒进”时，毛泽东又不断拿《论十大关系》说事，但说事的立意与过去已完全不同了。

《论十大关系》两重性涵义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多快好省”，还是要“综合平衡”的方针问题。周恩来、陈云等人在“反冒进”中提出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为中共八大所接受。在之后一年多时间没有再提“多、快、好、省”的口号。³⁷毛泽东借反右派运动之势在党内开展的批“反冒进”，实际上就是把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作为右倾思想来批的，从而改变了“十大关系”的协调发展的立论。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讲：1955年12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34个部长谈后，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后，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又复辟了。……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³⁸这与他在1957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02-403页。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9、309页。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

38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思想万岁》。

年4月30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调，已是大相径庭了。从毛泽东很有些情绪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认为“十大关系”给“反冒进”提供了一个正当性的理由。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犯了原则性错误，要求检查那段时间宣传“反冒进”的情况，并规定：作为方针来讲，不能讲“反冒进”，只能讲“调整”。作为倾向来反，就把多快好省反掉了。³⁹此后的经济纠“左”活动，统统都是“调整”。

“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是周恩来、陈云“反冒进”的理论依据。毛泽东的批“反冒进”是批周恩来，批“综合平衡”是批陈云。计划经济的综合平衡理论来自苏联工业化模式。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一般是指财政平衡、物资平衡、信贷平衡、外汇收支平衡，通常称为“四大平衡”。

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批评了大跃进会破坏国民经济平衡的担心。提出：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就敢于跃进了。

在1958年3月9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几个问题，在谈到学习苏联经验时，他说：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东西，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他强调指出，“对苏联的经验，只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⁴⁰在3月10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又列举了各部门搬用苏联规章制度的情况，批评重工业、计划部门的教条主义最多，强调学习要有独创精神，“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他把《论十大关系》的提出，作为中国开始走自己建设道路的开端标志。说：“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⁴¹

39 《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的传达记录稿》，1958年1月。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0页。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1页。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三本账”的动员经济思想。即：生产计划制定应有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账，在地方是期成的。“三本账”否定了综合平衡的必要性，是造成以后大跃进中，计划层层加码，追求高指标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处理“十大关系”各项关系的政策方针上，反“反冒进”之前，强调的是关系双方的主次有别的平衡关系；之后，强调的是关系双方的“同时并举”⁴²、“两条腿走路”的齐头并进。如在农轻重的关系上，周恩来在1956年5月3日传达时讲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发展农业、轻工业。⁴³而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提起了“多、快、好、省”的口号，确定了“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⁴⁴“同时并举”，由此成了“十大关系”的主题词。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讲话说：“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⁴⁵“同时并举”口号的提出，实际上是对“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的否定。

1958年5月5日，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代表中央批评了“反冒进”，使这三年在经济建设上出现一个“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形，高度阐释了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的重大意义，“为实现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规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是根据

42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正式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口号，《人民日报》1956年6月19日。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71页。

44 “同时并举”方针是邓小平提出，毛泽东予以肯定的。参见《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上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98页。

“十大关系”的方针提出来的。⁴⁶

毛泽东在会上大讲，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迷信。鼓励大家“要敢想、敢说、敢做、敢为”。5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讲，他所以提出十大关系，就是同苏联比较，找出一个可以比苏联等国搞得更快更好的方法来。⁴⁷从这些讲话可以看出，大跃进“赶英超美”的口号，实际目标是赶超苏联的。破除迷信就是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而《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样一个破除迷信的样本。

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报告中，列举了“十个关系”的题目：

（一）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合作社和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党内党外的是非关系；（十）国际关系。并根据毛泽东的观点，解释了这十个关系：“其中的第一项和第五项，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原则，以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互相结合的原则。第二项和第三项，指出了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地集中资金在经济建设方面。第四项指出了必须正确地处理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其他的几项，主要地是围绕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在后来继续发展了的观点。”⁴⁸

八大二次会议报告正式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反映了毛泽东反“反冒进”的思想。即：批判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消极平衡”论，主张制定计划要留缺口的“积极平衡”论，实行工农业齐头并进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实行高速度发展的“积极平衡”思想，这是“大跃进”给《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定位。对此，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八大二次会议，在批判消极平衡论的同时，就提出了使落后赶上先进的

46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53页。

48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积极平衡的主张，就指出了为着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需要保持一定时间、一定范围的平衡，并且指出，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工作的任务。”⁴⁹

毛泽东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是完全认可的，并有高度评价。他 1960 年写《十年总结》时，称这个报告“就比较一九五六年的十大关系以及后头什么多快好省那一些较为完整了。”⁵⁰

为了给党内高级干部提供一个完整的学习文本，1958 年 5 月 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绝密”件的形式，印发了毛泽东讲“十大关系”报告的一份记录稿，这份记录稿是研究《论十大关系》经典化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稿本。该记录稿的题目是《毛主席在 4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笔记）》。中办在印发该文件时，专门注明：“毛主席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没有正式记录，现将一个同志的笔记抄给你们作参考。这一笔记未经校阅，可能有错误，请勿翻印和引用原文。”⁵¹ 从文

49 薄一波：〈一九五九年工业战线的任务〉，1959 年 1 月 1 日，《红旗》杂志，1959 年第 1 期。

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421 页。

51 据《邓力群自述（1915-1974）》所称，这份笔记的记录者是邓力群。该书讲：因为毛泽东不准录音，杨尚昆要他在会场做笔记，当时很快就整理出来了。整理稿不仅内容记的全，没有遗漏，而且保留了毛泽东报告的语言风格。（邓力群：《邓力群自述（1915-1974）》，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267 页。）邓力群素以博闻强记著称，说这份记录稿出自他的手笔，本应是合理的。但该书所讲述的过程则颇有些疑点。首先是邓力群记录稿的会议时间问题，即记录的是那次会议？《自述》讲，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是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的意见，然后在 4 月 25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的口头报告。这肯定是错误的。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论十大关系》是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他住处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第一次讲的，而后在 5 月 2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第二次。把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升格为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以后的事情。当时邓力群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另外，这个会议记录整理的很好，条理清楚，结构完整，语言生动，也不似杨尚昆所称的毛泽东不满意的记录整理稿。而且，记录稿中的毛泽东有关文化和学术的讲话内容，显然是来自陆定一 4 月 27 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在 4 月 25 日原初讲话中是不可能讲出来的。笔者认为，这份记录整理稿应是毛泽东第二次讲“十大关系”的讲话，即

献价值上说，该稿本是中共党内最早整理印发的，应是最接近毛泽东原始讲话的文本。从整理语境上说，该稿本是在大跃进高潮时整理发给高级干部的，应比较符合毛泽东“鼓足干劲”赶超发展的思想。从内容演变上说，该稿本又是以后修改的诸稿本基础，对照1965年版本、1976年版本的异同，可以反映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在不同阶段的变化。

在这个1958年中办稿本中，相对完整地保留了毛泽东讲述“十大关系”时的原始内容信息。在该稿本中，直接评议了高岗、饶漱石、胡风、潘汉年、龙云、梁漱溟、彭一湖等十几个党内外人物，在讲述各项关系时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语言生动，议论风生，比后来的正式版本更能反映毛泽东讲话的神情心态。《邓力群自述》中用了5页的份量，将这一稿本与公开发表的经典文本进行了对比，对大部分删减内容做了详细说明，基本反映了原稿本的内容全貌。本文不再赘述。另外，海外研究者流传的一份题目为《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笔记）》⁵²的文件，内容相当完整，应是来自原件的文献材料。

从经典化的角度看，1958年中办稿本的主要价值有三个方面：

一是具有比较宏观的国际视野。该稿本在阐述十大关系时，有比较明确的国际参照系。参照对象主要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在农轻重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的错误，我们比过去的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作得好些。”在沿海与内地关系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有些缺点。”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现在全世界都在谈减少军事经费、发展和平经济的问题”，英国、法国、美国也都在谈和平，“现在是和平时期，军政费用的比重太大不好”。在国家、合作社

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十大关系”的报告记录。《邓力群自述》的整理者把它误认为是4月25日的讲话记录稿了。正是因为毛泽东对4月25日会议的整理稿不满，所以在5月2日再次讲“十大关系”时，杨尚昆特地安排邓力群等人去做了记录。但是《自述》又讲5月2日会议有录音，以后田家英还整理过一个记录稿。那么，1958年5月中办印发的内部版《论十大关系》，是田家英整理的，还是邓力群整理的，这是还需要进一步考辩的问题。这里姑且存疑。

52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2013版）。

和个人的关系上，必须兼顾集体和个人，“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来搞积累。”在讲镇反问题时说：“现在有人听到斯大林杀错了人，就说我们杀的几十万人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二是对斯大林及其政策有直接的批评。如讲剥夺农民的问题，“苏联的办法主要不是经过税收，而是经过价格，他们的税收不重，但是在价格政策上把农民挖得很苦。”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由于肃反扩大化削弱了干部，由于战略指导思想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不修工事，有攻无守。结果希特勒打进来，抵抗不住，只好按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直退下来。在这方面我们都比他们那个时候强。”还有对斯大林的看法问题，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1949、1950 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那个时候，除了党内同志以外，全世界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天天替我们辩护，不用工资，替我们做义务宣传，说我们不是铁托。说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火。可以，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在这里表述得很清楚，中共所以要对斯大林进行“三七开”的评价，完全是出于维护国际共运大局而左右持中的策略需要。

三是对十大关系的各项关系体现的政策背景交代得比较具体。如讲“1954 年和 1955 年工业方面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很多，但工人工资没有增加，而且由于副食品涨价，有些工人的实际工资反而降低了。”所以，今年准备用十三亿元来增加工资。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时说：“有人说我们的四级财政，实际上只是一级半（中央一级、省半级）财政，这是对我们的讽刺”。承认“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讲党和非党的关系时说：“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不打倒民主党派，不打倒梁漱溟、彭一湖，团结所有的人在我们的周围，让他们骂我们、反对我们，只要骂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也有阴暗面”。还评论说：“现在民主人士对中央满意，但对地方有意见，认为地方太简单，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明了这些政策背景，对理解“十大关系”诸关系的提出原由，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毛泽东最初讲的“是非关系”，突出强调的是处理党内关系的“一看二帮”，从这个版本就很清楚，这是以处理

“高饶事件”为背景的。他说：“人家犯了错误，你去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高岗跌跟头就是跌在这上面，他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四人圈圈，两个摊摊。就算有吧，也应当是一看二帮。但是，高岗不愿意这样作，结果跌倒了爬不起来。”这就点明了高饶事件起因于“小圈子”宗派问题。毛泽东还说：“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毛泽东点名对高岗“五虎将”的张明远等人要“一看二帮”，表明了他对高饶事件处理放宽的善后态度。

在讲学习外国经验不要盲从时，毛泽东列举遗传生物学的事例说：“胡先骕不赞成李森科的学说，苏联一些同志要我们批评他，刚刚把人组织起来要批评，李森科倒台了。”……。强调我们对苏联的事情不能亦步亦趋。

在文章的基调上，1958年稿本的《论十大关系》，最为积极乐观和充满自信。他认为：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中国并不很严重，而且也已经引以为戒。中国的农业发展政策要比苏联的好，工业发展问题也不大，可以后来者居上。与以后整理的几个稿本比较，这个稿本是最能体现毛泽东“弯道超车”思想的，与大跃进的契合度也最高。

在语言风格上，1958年稿本记录的毛泽东讲话，语言活泼，思路开阔，思想开明，与他在1957年2月发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整风讲话（原始版）相对照，不仅语言风格相似，用一些例子也都相同类似。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个文件在思想逻辑上的承继关系。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理论界、经济学界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论十大关系》的伟大理论意义，论证毛泽东“三个并举”的伟大理论贡献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英明指导。此时讲的“三个并举”，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报刊的宣传主调是：由于毛泽东正确处理了三者的关系，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呈现了跃进的面貌，创造了在世界历史上高速发展的空前奇迹。⁵³同时，还

53 参见卓群：〈论“三个并举”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理论与实践》，1958年11月27日。

批判了坚持“综合平衡”论点的一些专家学者。在批判马寅初的综合平衡“团团转”理论的有关文章中，指责马寅初把毛泽东“十大关系”作为了他的“综合平衡论”的论据。文章评论说：毛泽东讲的“关系”是不能有平衡替代的，“关系”的意义比“平衡”丰富得多。⁵⁴但什么是“关系”概念的丰富性，文章并没有论证。

在大跃进“积极平衡”的语境下，《论十大关系》的诸项“关系”，由具体的政策方针而高度抽象化和哲学化了，成为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哲学上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解释经济政策上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种高屋建瓴的辩证法哲学，具有解释上的万能性，属于空泛之论。其他如“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发挥两个积极性”，以及哲学上论证“不平衡是绝对的”等等理论，扭曲了《论十大关系》协调发展的本意，支持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在实践中，成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各行各业一切“大办”的理论依据。

在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在高指标、浮夸风极度膨胀的氛围下，中共中央在 1958 年 8 月召开北戴河会议。农业部党组 8 月 25 日给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说：1958 年粮食总产量超过 8,000 亿斤，比 1957 年的 3,700 亿斤增加 4,000 亿斤，增长一倍以上。北戴河会议公报压了一下数字，宣布 1958 年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6,000 亿斤到 7,000 亿斤，比上年增长 60% 到 90%，棉花产量达 7,000 亿斤，比去年增长一倍以上。而后制定的 1959 年的跃进指标是全国粮产量保证 15,000 亿斤，力争 2 亿斤。⁵⁵农业的虚假“大跃进”数字为工业的虚假“大跃进”的加快提速，提供了“动态平衡”的数字基础和虚拟条件。

北戴河会议为高估产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所惑，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从现在起要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我们一反苏联的所为，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拿农业压迫工业。现在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没有上轨道。他还说，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

54 舒德：〈评马寅初的“平衡论”〉，《理论战线》，1958 年 5 月 1 日。

5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88-689 页。

国。⁵⁶毛泽东建立在农业高估产基础上的大跃进决策，使工农业发展的“积极平衡”，成为了虚假数字的“循环论证”。

北戴河会议正式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当年钢产量翻一番的提议，确定了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提出了 1,070 万吨钢的任务。会议通过了大办人民公社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信心满满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⁵⁷

北戴河会议把高度社会动员的运动型经济推向高潮：千军万马，一哄而起，只求“多快”，不论“好省”，大干快上，“五风”猖獗。头脑狂热的敢想敢干，浮夸虚报的放卫星，异想天开的高指标，群众运动热火朝天，经济活动乱象纷呈；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打破了国家、集体、农民的产权界限，强行过渡共产主义，把农民的家庭财产搞得一贫如洗；中央盲目下放企事业单位，地方盲目上马各种项目，彻底搞乱了中央和地方的条块关系，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的严重失调。长官意志的瞎指挥，强迫命令的蛮干乱为，不计后果的乱铺摊子，无视现代科学技术的土法上马，兴师动众的劳民伤财，迅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后果。

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在微观经济领域的以苏联为鉴戒的群众运动新创举，就是以“鞍钢宪法”著称的企业管理制度。这是毛泽东 1960 年 3 月高度肯定和推广的鞍钢“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具体内容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它的否定对象是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毛泽东早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的讲“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提出了不要一长制的意见，但对党委制的企业管理制度如何搞，只有原则，并无经验。“鞍钢宪法”提供了这样一个党委制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范例。

在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毛泽东改变了之前纠“左”的姿态，变本加厉地继续推进大跃进，把战争动员型经济推到极端，进一步

56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421 页。

57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年 10 月 -1966 年 5 月）》第 28 册，第 409 页。

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意识到了大跃进确实首战不利，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搞经济建设确实需要专门知识，是比打仗还难的事情。他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比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理论对“论十大关系”立意的解说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和陈伯达、邓力群等人一起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从不相信搞经济比打仗还难，到困而读书，是知道了并试图弥补自己的知识短板。他下决心弄通这门学问。在广州鸡颈坑读书期间，他讲：解放后的几年，我们对搞建设懵懵懂懂，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心情不舒畅。1956年春找了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凑，搞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还搞出了农业发展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⁵⁸毛泽东此时谈论《论十大关系》的立意，已不再与“反冒进”和大跃进相联系，只是从历史发生学的意义上讲事情了，评说的调子已是比较低了。

此时，毛泽东显然不这么自信了。1960年5月27日，他跟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我没有什么经验，就是集中多了分散一点，分散多了集中一点。⁵⁹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的党内指示，简约地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基本脉络，部分承认了大跃进搞出了一些乱子，他自己也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十年总结》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1957年反右整风。1958年5月的党代会制定了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开始了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但是乱子出得不少”。大跃进与大办人民公社“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毛泽东认为的

5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8页。

59 1980年7月11日至1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长远规划设想〉汇报时领导同志的讲话，副总理薄一波的插话，载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三分册1980年卷）（自印稿）85页。

乱子，主要指三个方面：一是混淆了不同所有制的边界，二是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三是在农业上犯了错误。他还回溯历史，肯定了1956年周恩来在“反冒进”期间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⁶⁰，“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毛泽东批评有些人“忘记了实事求是原则”，还检讨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承认自己对如何搞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⁶¹在随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检讨说他在北戴河同意三千万吨钢的高指标，“不是发疯吗？”这是极为难得的自我批评，但他接着又说：“我对于自己的批评，对于别人的批评，都是限于局部性质。总的工作我们是做得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⁶²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老套路。

到1960年下半年，以河南信阳事件的东窗事发为标志，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全面暴露出来了。毛泽东虽然早知农村饿死人的事情，但对事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此时他不再讲“杞人忧天”的笑话了⁶³，下决心彻底纠正大跃进的“五风”问题。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⁶⁴过去那些“总的工作是好的”之类的套话空话，在饿殍遍地的残酷现实面前，实在是讲不出来了，不得不退缩下来，进行艰难的国民经济调整。

在调整时期，毛泽东很少再讲起《论十大关系》的事情。反倒是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还有时提到，并据此为国民经济调整的张目。刘、周等人此时所提起的《论十大关系》，立意放在了尊重客

60 周恩来在制定“二五计划”时，曾删去了“多、快、好、省”的字样。此事被毛泽东在反“反冒进”中，多次被提起批评，作为“三大错误之一”。参见《周恩来传（1949-1976）》上，第279页。

6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13页。

6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3页。

63 1960年4月，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农村饿死人的情况时，毛泽东戏称杞人忧天，但李的汇报还是引起了毛泽东注意。《李先念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30页。

64 《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1960年11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卷，第352页。

观规律，按比例协调发展，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各项关系等等，实际上是又回到了“统筹兼顾”的主旨上面来了。在国民经济全面退缩的调整时期，人们对《论十大关系》的认识，又悄然退回到了最初的原意上。

二、“农轻重”与“重轻农”

《论十大关系》的“以苏为鉴”，实际结果却是适得其反的。大跃进不仅重蹈了苏联的覆辙，而且造成的后果还更加严重。工业投资的几千亿打了水漂，农村经济残破，大量人口损失。从 1961 年到 1964 年，对《论十大关系》的学习宣传几乎戛然而止。毛泽东没有再提及，中央其他人也很少说起。在实际政策意义上提起的，也只是 1962 年有过几次。1962 年 1 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据，讲述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1962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中，讲到了《论十大关系》中的注意发展农业的方针。

1960 年代的国际国内环境已与过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苏 1950 年代的蜜月时期结束，两党围绕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一场言辞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中苏关系迅速恶化并走上分裂。中共批判苏共为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认为苏联已经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样，中共眼里的苏联角色地位，由过去亦步亦趋的导师、最亲密的盟友，变成了口诛笔伐的对手。中苏论战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如何认识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地位。中共坚定地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上，反对苏共批判斯大林，固守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并把苏联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引进市场机制的做法，当作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批判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斯大林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作为中国工业化赶超道路的样板意义，不仅没有因大跃进的失败而矮化，反而在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中，更加强化了继续奉行不悖的理由。

鉴于大跃进重工轻农的惨痛教训，在调整时期，中共中央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放到第一位，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首先

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周恩来曾把调整任务形象地概括为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⁶⁵它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是要把保障民生放在首位。这与《论十大关系》的原初精神是合拍的。

鉴于大跃进造成的民生凋敝，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关于“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确定以“吃、穿、用”为“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但是，毛泽东对这个“初步设想”很不满意，要求“三五计划”必须把加强国防放到首位，大力进行备战的“三线建设”。他批评国家计委的计划工作还是搞苏联那一套，指责他们搞“独立王国”。国家计委被迫检讨“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最后，毛泽东干脆设立的“小计委”取而代之。⁶⁶这样，“三五计划”从指导思想到起草机构实现了由改善民生向国防战备建设的转变。原来“三五计划”的一农业、二国防、三基础工业的方针，改变为先国防工业，后农业的重工业优先方针。1965年6月16日，余秋里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的方针时，谈到有人对把加强国防建设放在首位提出异议，认为这样做违反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毛泽东不以为然，坦然说：“是要违反一下，不违反一下怎么行哩！是倒过来了。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⁶⁷

在调整“三五计划”方向的同时，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树立大庆油田、大寨大队为工农业建设的学习样板。毛泽东试图在国家农业投资减少的情况下，靠大寨大队的自力更生精神发展农业；在缺乏引进技术、国外设备、管理经验的外援条件下，以“两论起家”⁶⁸的艰苦奋斗精神发展工业；在否定物质利益原则的思想革命化前提下，以

6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633页。

66 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4、272页。

6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1页。

68 “两论”即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当时宣传大庆油田是中国工人阶级靠学习“两论”发现和自力更生开发出来的大油田，是气死“帝修反”的“争气田”。

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调动全体民众的革命精神。同时，鉴于大跃进高征购的惨痛教训，毛泽东要求“三五计划”必须留有余地，防止再出现“涸泽而渔”的情况。⁶⁹根据毛泽东大力推进国防建设，同时又要兼顾民生的思想，周恩来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这是文革战备经济指导思想的发端。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结束，第三届全国人大重新提出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毛泽东强调“三线建设”，国防建设第一的指导思想下，继续了“以重为重”的国家工业化发展模式。在社会发展模式上，毛泽东在1966年5月又以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份军队搞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为由头，提出了以“一业多兼”为体制目标的“五七指示”，作为继人民公社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模式。“五七指示”是以各行各业“小而全”的社会单位，消解大生产社会分工的专业性；以简单劳动的平均主义，消解复杂劳动的多样性；与大工业的社会化分工精密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些国家重大方针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越来越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高层分歧越来越大。在国家经济政策向左倾化逆转的情况下，《论十大关系》的政策指导价值重新凸显出来了，再次进入中央高层的政治视野之中。

国家经济建设再次进入发展轨道之际，一些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为了明确国家工业化的政策指导理论，再度提起了整理和发表《论十大关系》的事情，以建立全党在经济建设方针上的共识。从党内分歧的角度看，这也可以认为是中央一线应对毛泽东决策多变的一种因应之策。1965年9月，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陈伯达主持整理出了一份《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9月23日，彭真将这份讲话整理稿报送给毛泽东，并附上了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这篇讲话，虽然是在十年前讲的，但因为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根本规律，对今后工作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建议早日定稿或者先在党内发表。”⁷⁰但毛泽东没有立即答复。彭真感到这篇文献的现实意义重大，急不可待地于

6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7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彭真年谱》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54页。

10月10日将《论十大关系》印发给党内高层领导和省、部主要负责人参阅。

在彭真报告上达两个半月后，12月14日，毛泽东与刘少奇谈话时，刘少奇又提出印发《论十大关系》的事情，建议作为内部文件下发县、团以上党委学习。毛泽东当时同意了。次日，刘少奇就印发《论十大关系》一事正式致信毛泽东。信中说：“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党委学习。”还说：“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但毛泽东自己又有考虑，他在18日批示：“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⁷¹

196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751号文件，下发了《论十大关系》。文件下发限于县团级党委的范围，并特别注明“不登党刊”。中央下发的批语说：“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纪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⁷²

陈伯达整理的《论十大关系》（简称1965年稿本），其历史语境是经过大挫折大教训之后，党内又出现了新的分歧。经过大跃进的挫败，经过几年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初步得到恢复，中央又重新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四个现代化）目标，但同时党内高层分歧乃生，1964年底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直接冲突。这些事情，陈伯达都是亲历者和重要参与者。陈伯达跟随毛泽东多年，为毛泽东起草过许多重大文件，对毛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观点非常熟悉。他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主要文件的起草者，又是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活动参加者，经历了毛泽东从狂热到冷静的思想起伏过程。在1964年又按照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指示，以国家计委副主任身份批评国家计委制定“三五计划”的工作，指责他们的计划工作是照搬了苏联的框框。

7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7页。

7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49册，2013年，第416页。

另外，陈伯达亲身经历了毛、刘 1964 年底那次冲突的全过程，对高层矛盾的激化十分担忧，希望毛泽东能把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来。所以，他对整理《论十大关系》应是怀着格外的一份用心。从学养上说，陈伯达不但对中国古代哲学有研究，对现代工业也很感兴趣，还有些电子工业方面的专业性知识。这些背景因素和个人偏好，使陈伯达整理的《论十大关系》具有特定的文风特点，与前后稿本都有明显的不同。

从整理技术上说，陈伯达版的《论十大关系》整理稿，是以毛泽东 1956 年 5 月 2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了 4 月 25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的部分内容，再加工整理而成的。彭真认为整理得很好，保留了毛泽东原始讲话的思想风貌。他在 1965 年 10 月 30 日将《论十大关系》整理稿送给林彪阅看，特地附言说明：“这是由陈伯达主持，根据原始记录整理的。不仅保持了原来讲话的风格，而且尽可能用了原话。”彭真高度赞扬《论十大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是长期的工作方针。”⁷³然而，彭真这个高大上的政治定位，与毛泽东“不太满意”的自我评价，对不上口径，是很有些落差的。

1965 年稿本，题目定为《论十大关系》。诸节的小标题也基本敲定了。如将第十条“国际关系”，改为“中国和外国关系”，与以后的正式发表本相同。内容上，1965 年稿本因为是下发到县团级的党内文件，传播范围较广，在文字处理上不能不慎重，有些人名和数字就给处理掉了。据能够看到毛泽东原始讲话的学者讲：在这个整理稿中，原讲话内容中的对苏联在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批评、对斯大林问题的批评，以及对党内高估战争危险、不重视发展沿海地区、照搬苏联行政管理的做法等等，都没有整理进去。⁷⁴这当然不是疏忽，而是有意为之的，是要留下自圆其说的余地。虽然 1965 年稿本在保存毛泽东讲话原貌上不及 1958 年稿本，但增加了一些辩证法的哲学色彩，在理论上有所提升。

从经典化的角度看，1965 年稿本的整理已比较规范化了，主

7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彭真年谱》第 4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 445 页。

74 刘金田、吴晓梅：《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台湾：台海出版社，2012 年，第 147 页。

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增加了哲学元素，提升了理论化程度。1965年稿本在一开篇就是以矛盾概念来讲关系的。“这些关系，都是一些矛盾。世界到处都是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在具体论述各项关系时，也比较注意它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还关照到一些技术性问题。如论证“不发展轻工业就不能发展重工业，不利用沿海工业就不能建设内地工业”的问题时，除了讲沿海工业的技术高、质量好、成本低、创新强之外，还特别论证了沿海工业要培养40万技术干部的问题。这是其他稿本都没有提到的地方。

二是对于论及苏联、东欧等外国党的地方，一般不提名字，采取回避的处理方式。如讲到工业与农业关系时，就没有再点名举苏联、东欧的例子；讲国防建设问题时，也拿了解放军与苏联红军做对比的例子。在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也去掉了“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之类的话。在讲中国与外国关系时，也隐去了斯大林、苏联的名字，只是泛泛而谈地讲“不可以搞成一种偏向，对外国的东西一概照抄，机械搬运。”

三是对各个对应关系的文本整理，带有了大跃进后的反思意味。如在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上，1965年稿本比1958年稿本增加了一倍多的字数。特别强调了“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是很清楚的。解放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哪一年的农业丰收了，我们哪一年的日子就好过。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增加了“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1958年稿本的重点是如何开发边疆地区经济的问题，1965年稿本的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政治问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上，1958年稿本讲的是镇压反革命的活动还要继续两年，是从公安工作部署上讲的，体现的意思是以后不再搞大规模镇反运动。1965年稿本强调的重点则是对反革命实行宽大政策，“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都有奔头。”这是从分化敌人的角度讲的，体现的意思是对反革命分子管理的常态化。文革运动一来，这些政策自然都不会讲了。

平心而论，从文本内容和语言风格上讲，《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所有著作中，语气最平和、论理最充分、内容最丰富、政策价值最高的一篇文章。不仅语言上没有那种论辩斗争的火药味，对当

时重新工业化的经济建设也有非常现实的政策指导意义。即使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领袖崇拜的意义上讲,《论十大关系》也比林彪提倡的“老三篇”⁷⁵更有理论内涵,更容易得到人们的信服。况且,向全党印发学习《论十大关系》,是中央集体的一致意见,刘少奇又请示过毛泽东。但最后毛泽东还是只让印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而且还专门要求文件写上他对文稿的保留意见。这确实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现在一般性的解释是,毛泽东此时要发动文革,要打倒中央一线领导人,无心于经济工作,所以不宜正式下发《论十大关系》。但这种解释固然有些道理,但还是从文革发生逆推过来的线性逻辑,似有些简单化了。应该说,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论十大关系》的诸条方针,农、轻、重的关系、内地与沿海的关系、经济与国防的关系等等,与毛泽东此时大力推进内地“三线建设”国防工业为重点的方针,在理路上是对冲的,在实践上是抵牾的。而且1965年稿本对“以苏为鉴”的淡化处理,与毛泽东当时的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意图也是不合拍的。所以,毛泽东此时的不让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应是对党内外国内外的各种因素综合性考量的结果。

在1965年稿本的整理和下发过程中,毛泽东与中央一线在经济建设路线上的分歧冲突已隐约可见。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把党内高层在建设路线上的分歧公诸于世,上纲上线为“建国以来的两条路线斗争”。《论十大关系》的文本在文革的“路线斗争”政治中,也被抽象化和标签化了。一方面把它作为毛泽东发展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一方面又把它作为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批改”理论武器。

康生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论证毛泽东“全面发展丰富了超过了马列主义”。对哲学的发展,是提出了“一分为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提出了“十大关系”的理论。康生说:十大关系,也叫十大

75 “老三篇”即: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的三篇短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矛盾，“又是经济学，又是哲学”。⁷⁶

在文革的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中，《论十大关系》被推崇为“伟大的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的文件，丰富、发展、并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又把“反冒进”作为《论十大关系》的对立面被批判，归为了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名下，称他们“表面喊赞成（《论十大关系》），实际大叫‘反冒进’”。⁷⁷在“斗批改”的旗帜下，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发表了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批判刘少奇、陈云、薄一波违背《论十大关系》，大搞“反冒进”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一些合理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方法，如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企业效益的成本核算、劳动者按劳分配的原则等等，都被批判为“消极平衡”、“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经济领域“修正主义黑线”。

在文革“斗批改”运动中，大量的党内文件、工作笔记、领导讲话等内部材料流入社会，有许多毛泽东内部讲话的资料，被群众组织编成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各种学习材料。1965年稿本的《论十大关系》也由此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了，让一般普通民众也见识了这篇著名文献的“庐山真面目”。文革中的这个民间性质的毛泽东文稿的编辑传播学习的活动，在《论十大关系》经典化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一段历史。

文革的经济运行方式是“抓革命、促生产”，政治运动左右经济活动。先是文革造反运动对经济活动的冲击，造成了两年国民经济急剧下滑，1968年降到谷底。两年间共损失工农业总产值1,100亿。1969年随着局势趋于稳定，经济开始初步回升。同时在大战备的驱动和军人集团主政的体制下，又开始了新一轮“与帝修反抢速度”的大干快上，大跃进的痼疾再度发作起来。

文革“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活动，与大跃进运动大刮“五风”的动员方式不同，但都是战争动员型的经济模式，出现的问题有高度的同质性。九大后的战备经济，以政治运动为动员手段，很

76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5日。中共北京市委资料室编：《康生言论选编》（二），1967年3月，第54页。

77 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李富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经济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1967年4月18日。群众组织翻印件。

快造成了一系列问题：1、基建投资猛增不已，国家积累率过高不下。1970年的积累率由上年的23%提高到32%，造成人力物力全面紧张；2、三线建设盲目上马，内地建设的乱铺摊子。1970年内地建设投资占到60%，为历年最高。大批项目有数量无效益；3、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内地与沿海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过分突出重工业，挤压农业、轻工业。1970年农业投资比重只占8.4%，轻工业投资比重只占3.7%，都低于1966年的投资比重。4、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按照毛泽东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以块块为主”，中央企业事业单位大规模下放地方，短时间内一哄而下，实际上更加剧了条、块矛盾；5、军人执政集团宣扬“打仗就是比例”，不顾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盲目上大军工项目。各工业部委（条条）召开一系列专业会议，再次提出来“翻番口号”，进一步助长了盲目冒进的势头；6、地方小型工业遍地开花，“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水泥、小化肥、小农机、小煤矿）大发展，盲目性很大，浪费和污染问题严重。⁷⁸在工矿企业效益大幅递减的同时，在农村“一平二调”的做法时隐时现，工人农民的实际生活下降。宏观经济失调，微观经济僵死，经济活动再次陷入混乱。

上述这些经济政策，与《论十大关系》中的统筹兼顾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又再次重复了大跃进的错误，也导致了同样的结果。到1971年，国民经济就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危险的信号。1972年，“三个突破”还在继续发展，甚至还动用了国家的粮食库存，造成国民经济一系列比例严重失调。⁷⁹

文革经济“三个突破”的出现，与大跃进的严重比例失衡同出一辙，都是运动型经济方式必然导致的结果。而在政治统帅经济的革命年代，对问题的发现和进行调整，则只能是林彪事件之后才能够做到的事情。1972年和1973年，国务院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宏观经济的调整。如：控制和压缩基建规模，调整“四五”计划高指

78 柳随年、吴群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2、376、377、385-389页。

79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54页。

标，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数，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数，调整农轻重关系，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加强统购统销的管理……。这些控制“三个突破”的措施，与调整时期的措施是一致的。到1973年，“三个突破”得到了有效控制，经济秩序逐步好转。然而，好景不长。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又使刚刚趋于稳定的社会再度动乱起来，国民经济形势又发生了逆转。

三、“抓革命”的生产与“抓生产”的政治

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大刀阔斧进行治理文革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消除派性，恢复正常工作秩序，使国民经济形势迅速好转。为了给全面整顿工作树立一个高屋建瓴的思想旗帜，在理论上掌握话语权，邓小平利用主持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机会，再次提出了发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事情。

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大事项。田家英整理毛选四卷是轻车熟路，对编辑五卷却不太积极。他虽然参加了五卷的部分编辑工作，但对编辑五卷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著作还不成熟，甚至有的是错误的。⁸⁰ 陈伯达、康生对编辑五卷十分积极。陈伯达曾搞出了一个《五卷试选》本，毛泽东不满意。文革中，林彪取代刘少奇任毛选编委会主任。1969年中共九大后，林彪委托康生主持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曾搞出了一个毛选五卷的送审本。但毛泽东仍不满意。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接手了毛选五卷的整理编辑工作，由刚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具体承担。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机密性很强的事情，参与者的范围很小，首篇整理的就是《论十大关系》。这不仅因为《论十大关系》的文本基础最好，更是出于文革后期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邓小平指示毛选五卷编辑工作小组负责人胡乔木，首先花力气把《论十大关系》整理好。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非常熟悉毛的文字思路。他在毛泽东批准的4月25日和5月2日两次讲话记录整理稿的综合意见基础上，对《论十大关系》文稿重新进行整理，补充了以前没有整理进去的内容，并做了

80 刘金田、吴晓梅：《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台湾：台海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一些文字加工。送交给 1975 年 7 月 6 日邓小平主持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会议读稿讨论。之后，又根据讨论意见进行了补充修改。⁸¹

这次整理《论十大关系》，与上次文稿的整理已相隔了十年。经过文革动乱的前后对比，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楚了。邓小平要求首先整理出来《论十大关系》的这一举动，是有着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现实政治意义。在 7 月 6 日的读稿会上，当读到“是非关系”中讲的“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不要幸灾乐祸”这一段时，邓小平有感而发地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实行这一条。他还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路线不是空喊。⁸²

7 月 10 日，胡乔木将整理好的《论十大关系》文稿送邓小平审阅。7 月 13 日，邓小平把胡乔木整理的《论十大关系》文稿，送给毛泽东审阅。并附上请求公开发表文章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毛泽东当日圈阅同意，但否定了邓小平公开发表的建议。他批示说：“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⁸³这是毛泽东有意留下的一个政治伏笔。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在 7 月 22 日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体阅读《论十大关系》，并拟定了下发通知。7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经过重新整理，主席已经同意，决定印发全党讨论。全党应作为当前理论学习的重要文件之一。⁸⁴为了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领域的全面整顿，明确工业化建

81 胡乔木传编辑组：《胡乔木传》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 年，第 449 页。

8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66 页。

8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出版，第 444 页。

8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献

设的一些方针政策，解决无章可循，管理混乱的问题，在邓小平指示和指导下，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起草了一批不同领域的整顿文件，如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科学院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等。⁸⁵ 这些文件的起草，思想上是对《论十大关系》的承继和发展，规制上是1960年代调整时期各项条例的承继与发展，所针对的是文革那些严重而又迫切的现实问题。如1975年8月18日国务院讨论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七条指导意见，第一条就是“确立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到第一位。”同时特别强调了科学技术，视为“多快好省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⁸⁶ 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反对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盲目的自力更生”，这可以看到邓小平全面整顿思想，与《论十大关系》在理路上的联系。

然而，在1975年底，毛泽东出于维护文革路线的需要，否定了邓小平的整顿，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还没有正式下发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三个文件草稿，被作为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进行全民批判。邓小平主持的毛选五卷编辑工作自然也进行不下去了。不仅《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搁浅，胡乔木等文稿整理者还受到了批判，被排斥出编辑五卷工作之外。

在毛泽东逝世后，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抓捕了“四人帮”，结束了为祸十年之久的文革。为了表明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新的党中央加快了毛泽东著作的出版。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1975年由胡乔木主持整理的这部《论十大关系》文稿，标志着《论十大关系》经典化过程的完成。

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85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国务院研究室按照邓小平指导思想制定的，邓小平并没有看过。

8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3页。

由于我们无法看到各稿本整理的工作过程稿，无从知晓具体整理的技术环节，只能从时代语境与已经成稿的文字上分析它们的文本异同。整体上说，虽然各稿本都有不同差别，而变化最大的还是 1975 年稿本。这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是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层有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在五卷整理小组内部还有李鑫等人的掣肘，胡乔木整理文稿的内外环境是非常逼仄的。这些时代因素不能不反映到最终定稿的《论十大关系》上来。在文字的表述上，1975 年稿本不如前面整理稿本讲的贴切，语气也不如前面的从容。在内容的整理上，它所论述的十大关系的问题，是以这些问题在我们这里并不严重的口吻进行表述的。这样一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就只有“以苏为鉴”的对比性和未雨绸缪的前瞻性，而无中国自身问题的现实针对性了。这样的叙述方式，十大关系的提出就显得比较生分了。

上述三部不同稿本的异同性，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文本字数和份量轻重。在文字数量上，1958 年稿本有 9,474 字；1965 年稿本有 11,330 字；1975 年稿本有 12,523 字，是文字加工量最多的。另外，三个稿本在叙述各项关系上的用墨份量也各不相同。从各稿本叙述每项关系的用墨多少，能对其整理工作和指导思想有个一般性了解。列表如下：

编号	十大关系	邓力群稿本	陈伯达稿本	胡乔木稿本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559	1349	808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961	1103	740
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666	691	664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1728	1538	1732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1231	1002	1368
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321	379	633

编号	十大关系	邓力群稿本	陈伯达稿本	胡乔木稿本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854	800	934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722	1183	1772
九	是非关系	718	936	931
十	中国和外国关系	1154	1457	2071
总计	各稿本的全文统计	9474	11330	12523

从表中可见，1965年稿本在论经济关系方面的字数份量比重较大；1975年稿本在论政治关系方面的字数份量比较大。如“农、轻、重关系”，邓力群稿本是559字，1965年稿本是1,349字，1975年稿本是808字。75年稿本比65年稿本顿减500多字。而“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1958年稿本是700多字，1965年稿本是1,100多字，1975年稿本是1,700多字。1975年稿本又比1965年稿本增加600多字，比58年稿本则增加1,000多字。这反映了1975年稿本的“政重经轻”的特点，而与毛泽东1956年讲话的原意就有很大的齟齬了。毛泽东当时说过：“十大关系”主要是前五条。即重点是经济关系的内容，而非政治关系的内容。而1975年稿本则是“政重经轻”，后五条的政治关系内容大大扩充了。这个文章的侧重点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心变化。

二是政治语境与行文风格。1958年稿本的行文最为自然流畅，口语化程度最高，语言生动活泼。1965年稿本的行文就有了拘泥之感，避讳较多，文体已是半格式化了。1975年稿本的行文更为刻板，格式化程度更高，一些语言文意还有些拘滞。这或是因为胡乔木刚复出不久，心态比较拘谨，加之整理时的掣肘比较多，不得不刻意迎合时代，突出正面语言所致，从而最终完成了从讲话体到文件体的转换。1975年稿本反映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政治动向。邓小平对整理和发表《论十大关系》非常积极，有他的政治意图，就是想用这个尚方宝剑来消解张春桥的“学理论”反法权运动。他对胡乔木说：这篇文章在经毛主席审阅同意以后，应当发给全党讨论。这是理论学习的好材料，不学习毛主席的这些著作，全国的理论学习怎么深入得下去？⁸⁷邓小平在读《论十大关系》时，

87 胡乔木揭发的邓小平的言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材料组编：《邓小平言

还批评了文教领域没有执行“双百方针”的问题，要政治研究室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从这方面讲，邓小平整理《论十大关系》，与所谓的“三株大毒草”⁸⁸，属于同一个纠正文革错误的思想整顿系列。

三是在文体和内容上，1975年稿本带有着文革“反修防修”的时代印记。在《论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目标宗旨上，1958年稿本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65年稿本是“……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975年稿本则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从“建设”到“事业”，是宗旨的重心转移，从经济转移到政治。在三个稿本中，1958年稿本比较符合原始讲话，从经济政策上正面讲“以苏为鉴”的问题。1965年稿本也是强调经济方面，但回避了一些谈论苏联的问题。1975年稿本比较强调政治性，点名批判苏联，用语口气也最重。

在内容整理上，各稿本突出的重点也不同。如讲镇压反革命问题，1958年稿本讲，今明两年“还要作两年的艰苦工作”。这是讲具体工作的安排；1965年稿本讲，“还要做长期的艰苦工作”。这是讲一般性政策原则；1975年稿本讲，“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则在一般性原则中，突出强调了肃清内部敌人的重要性。显然，这是受到了文革“继续革命”与“走资派”斗争的语境影响。

在“以苏为鉴”方面，各稿本的用语轻重各不相同。如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一节里，在谈学习外国经验时，各稿本都强调要有民族自信心，但分寸感大有不同。但1958年稿本和1965年稿本强调的是，“一切外国人的长处都学”，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说大人则藐之”。而1975年稿本讲学习外国，完全是端着架子批评苏联等国的问题，强调中国的后发优势。如讲“一穷二白”的问题，1958年稿本是：中国“很多地方不如人，翘不起尾巴，

论摘录（续编）》，1976年4月。

88 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力批判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三个文件。

一曰穷，二曰白，骄傲不起来。”1965年稿本是：“一穷二白，使我们的尾巴翘不起来。”而1975年稿本则成了推崇“一穷二白”，认为有后发先至的优越性：“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这里完全是一番“越穷越革命”的道理了。中国国情贫困落后的后发劣势，反而成为了能够取得更快发展的赶超条件。“一穷二白”反倒成为了中国后来者居上的发展优势，这是盲目鼓吹“自力更生”的文革时代语境使然。

在关于批评斯大林的问题上，三个稿本的整理分寸也不一样。1958年稿本说“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听说批评斯大林了，又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这里的主语并非是指苏共二十大，也不是说批斯大林不对，而是说我们在批评斯大林上不要“走极端”跟风转，给“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公道。1965年稿本则完全删除了这段话，没有提“三七开”的问题，全部回避掉了。1975年稿本则重新补充上了这段话，但主语已是苏共二十大，话锋也是谴责性语言了。1975年稿本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则完全是一副批判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的否定口气了。这与毛泽东当时发表讲话的平和语气是不一致的。

另外，1975年稿本中讲的，斯大林在国共内战时限制中共“不准革命”的话，“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并不见于前两个稿本。这应是在波匈事件之后，毛泽东在1956年11月讨论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讲的话⁸⁹。1975年稿本所衍入的毛泽东后来讲的这段话，显然是受到了要突出毛泽东英明伟大的文革时代语境的影响。

在一些数字的处理上，1975年稿本更为保守的。如讲“一五”时期的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重，1958年稿本和1965年稿本都讲：占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即有三分之一的支出用于不生产的方面。而1975年版本讲的比例是占百分之三十。这个降格处理，显然是有意为之的。

三个稿本结语的口号，也反映了时代背景的变化。1958年稿

89 吴冷西：《忆毛泽东——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20页。

本的结语口号是：“为巩固和加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而奋斗！”，反映了东西两大阵营冷战的时代背景。1965年稿本的结语口号是：“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而奋斗！”，反映了中苏论战的时代背景。1975年稿本的结语口号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映了文革后期毛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代背景。三个不同口号，也反映继续革命的内卷化进程。

有论者认为，毛泽东对胡乔木整理的稿本一字未改，表明了他的高度认可。但是，毛泽东此时已是风烛残年，去日无多，而且正患眼疾，准备做白内障手术，对稿本已不可能再字斟句酌地推敲。也就是说，改不动了。这种情况下，不能说一字未改就等于“十分肯定”了。毛泽东不同意公开发表，或可以认为也是一个不满意的态度。张春桥当时就对身边人说：“毛选五卷的书稿已被胡乔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难。”⁹⁰。

当然，毛泽东不同意公开发表，肯定不会只是文字修改的技术问题，更多的还是政治上的考量。文革后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很是微妙。毛泽东是政经两手抓，一方面让邓小平抓经济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另一方面让张春桥抓意识形态，通过“学理论”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坚持文革的“继续革命”路线。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政治平衡关系。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政治前提，就是绝不允许触动他的文革底线。他期望在“抓革命”与“促生产”中间，保持一种政治上的平衡关系。《论十大关系》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键是要处理好各方关系，这对整顿文革搞乱各个领域的工作，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邓小平想通过学习《论十大关系》，纠正文革错误，转移“学理论”的方向。这也正是毛泽东担心的事情。所以，无论在文字上如何修改，毛泽东也都不会让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没有同意邓小平要求立即公开发表的建议，要放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表时再一并公布，是有着要维护文革路线的深谋远虑。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论十大关系》正式发表，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热潮。宣传的主题是“调动一切积极因

90 《肖木（王洪文秘书）给上海市委的信》，1976年9月18日。

素”，实现“四个现代化”，表达了华国锋时代“抓纲治国”的政治需要。《论十大关系》的公布，表示着抓革命时代的结束和抓生产时代的开始，为华国锋推行和实施各项政策方针，提供了一个来自最高权威的指导思想。

正如上述所言，《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过程并非是完善化过程，而是一个击鼓传花的过程。在这个经典化的整理过程中，文本受到了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不断打上了许多时代的印记，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在政治风雨中反复洗刷出的版本。最后这个经典版本的出台，由于衍入了许多后来政治运动的附加值，不仅与原始版本的讲话原意有较大差异，在理论逻辑上更加龌龊了，在文字表述上也不是最恰当的。这个最终的经典版本，在完善和如实的意义上，是要比前两个版本更加逊色一些。

从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到1976年12月《论十大关系》的正式公布于众，经过了20年的时间，先后搞出了三个稿本。但是，《论十大关系》统筹兼顾的工业化理论却没有真正落实到中国的工业化实践上来。历史走了一条反其道而行之的左倾化道路，由激进的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发展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路线，这是《论十大关系》整理语境不断劣化的历史背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背离，经济与政治的冲突，可能是毛泽东晚年很少再提，也不愿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的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

从经典化的角度看，《论十大关系》三个稿本整理的历史语境，是中国政治左倾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击鼓传花到最后的整理稿本，则是在左倾语境最严重时期搞出来的。稿本内容和语言与原始初衷也是偏离最远的。此景可用欧阳修的一句诗文道之，“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然而，在经典化过程中的这些历史风雨侵蚀刻留的版本标记，对认识毛时代的工业化却是不无裨益的。

参考文献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1993年。
2. 薄一波：〈一九五九年工业战线的任务〉，1959年1月1日，《红旗》杂志，1959年第1期。
3. 薄一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
4.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三分册1980年卷）（自印稿）。
5.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6. 《胡乔木传记》编写组：《胡乔木传》上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
7. 李富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经济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1967年4月18日。群众组织翻印件。
8. 《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年谱》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9. 柳随年、吴群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11. 刘金田、吴晓梅：《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台湾：台海出版社，2012年。
12. 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3. 《论十大关系》，中共中央1965年12月27日下发党内文件版，中发[65]751号。
14.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人民日报》1956年1月12日。
15.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传达稿），1958年1月。
16. 舒德：〈评马寅初的“平衡论”〉，《理论战线》，1958年5月1日。
17. 吴冷西：《忆毛泽东——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
18. 〈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人民日报》1956年1月1日。

19.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 《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2013版)。
20. 姚文元: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1 期。
21.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9 年。
22. 中共北京市委资料室: 《康生言论选编》(二), 1967 年 3 月。
2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 《陈云文选》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传》,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年 10 月 -1966 年 5 月)》, 第 22 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彭真年谱》第 4 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年。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30.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部办公室: 《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 1 期, 1957 年 6 月 26 日。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刘少奇年谱》,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朱德年谱》,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页。
34. 朱德: 〈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 《党的文献》2007 年第 3 期。
35. 卓群: 〈论“三个并举”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理论与实践》, 1958 年 11 月 27 日。
36.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传(1949-1976)》,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